

# 邓子恢

# 淮北文稿

DENGZIHUI HUAIBEI WENGAO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淮北分会  
江苏省泗洪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编



人民出版社

# 邓子恢 淮北文稿

DENGZIHUI HUAIBEI WENGAO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淮北分会  
江苏省泗洪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编

主 编：李松科  
副主编：蒋中健 邓淮生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春林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张 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子恢淮北文稿/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淮北分会  
江苏省泗洪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01-008437-4

I. 邓… II. ①京…②江… III. 新四军-史料-淮北地区-1941~1945  
IV. E2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1501 号

## 邓子恢淮北文稿

DENGZIHUI HUAIBEI WENGAO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淮北分会  
江苏省泗洪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6.5  
字数:69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08437-4 定价:9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邓子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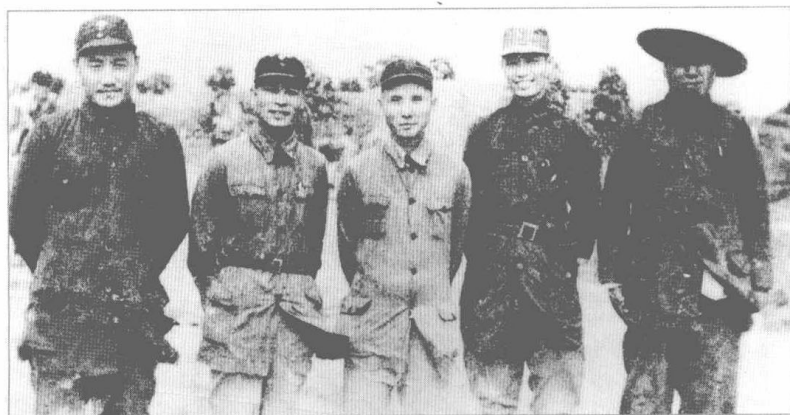


1941年5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奉命离淮南去淮北视察工作时和新四军二师同志合影。前排左起：张云逸、邓子恢、张凯、梁国斌、张劲夫



1942年，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左二）和淮北行署副主任陈荫南（左一）合影。左三为其弟邓子鸣

1944年8月，淮北党政军领导同志欢送部队西进时的合影。左起：刘瑞龙、彭雪枫、邓子恢、张震、吴芝圃



# 代序 一

## 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

杨尚昆

邓子恢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他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以来风云变幻的漫长岁月，不仅是历次伟大社会变革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而且在许多重要历史时期是某一地区以至于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邓子恢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和胆识与张鼎丞等同志组织了闽西农民暴动，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后，他冲破千难万险，回到闽西南坚持斗争，是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人之一。在各个历史时期，邓子恢同志都担负着党、政、军的重要职务。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他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的实际紧密结合。他在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军队政治工作、财经工作、土地改革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建树和开拓精神，曾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建国后，邓子恢同志主持中南局的工作，领导中南地区出色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和人民政权巩固的艰巨任务。他在这一时期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在农村和群众工作方面的独特创造，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不久，邓子恢同志即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农村工作。他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倾注了毕生精力。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子恢同志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

则和群众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抗战胜利后,他在华中解放区推行“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分地方针。在五十年代指导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他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坚定地实行党中央肯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方针。在随后纠正人民公社运动中“左”的偏差时,他提出了一系列调整经营体制的意见,主张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然而这些正确主张,在当时“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却一再被斥为“右倾”、“小脚女人走路”、“刮单干风”,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出于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他始终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向党组织直抒己见,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历史已经证明,过去对邓子恢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邓子恢同志关于农村体制和经济改革的主张,就是当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导。他将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连同他的历史功绩载入史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为邓子恢同志平反昭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对邓子恢同志的公正和崇高的历史评价。

邓子恢同志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处顺境而不骄矜,处逆境而不消沉,处困境而思奋进。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革命征途中的艰难险阻,更加磨炼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增强了他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邓子恢同志平易近人,经常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在群众之中,一生都与人民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在制定方针政策时,总是从农民摆脱贫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出发;他光明磊落,坚持真理,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从不向党伸手,更不追求享受。当全党全民沿着邓小平同志指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提倡这种精神。“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邓子恢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为我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同志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

重要论著,这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这部文集连同《邓子恢传》、《回忆邓子恢》反映了邓子恢同志一生的许多感人经历和思想观点,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画卷的许多生动场面,是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好教材。这三部书的问世,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邓子恢同志,学习和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都是很有意义的。

1996年4月



## 代序二

# 民主作风 长者风范

张爱萍

邓子恢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20 多个春秋了。每每想到他,或与老战友一起谈及他,就想到他那宽厚长者的形象和令人难忘的民主作风。

1930 年底,我从上海调往中央苏区途经闽西,因故暂留共青团闽西特委工作时,就听说邓子恢同志 1929 年春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1930 年 3 月当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遗憾的是,当时他被派往闽中和闽东地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和游击队工作,未能见到。

直到 1932 年 7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我在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工作时,才得以幸会,并常在工作中有所接触。

1933 年初夏,政治气候好像比大自然气候来得要快,骤然处于炎夏酷暑之中。在不少领域里纷纷批判右倾思想、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同志领导的财政部首当其冲。记得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一些激烈的发言指名道姓地批判邓子恢同志把钞票印多了,发乱了,影响了中央苏区的货币流通,破坏了苏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财政工作上的表现等等。当时,我们几个参加会议的青年,都感到这些批判失之于公正。印发钞票这样的重大事情,都是中央政府决定的,怎么能把责任都压到财政部长一个人身上呢?又怎能说成是危及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呢?我们深为邓老不平。万没想到,邓老在对他批判之后的检讨中,态度十分虔诚,把印发钞票以及财政工作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再三表示承认错误,接受批评,并诚恳要求组织给予严肃处理,毫无上推下诿之意。面对这一态度,

我心想这老同志真不简单！蒙受委屈，毫不争辩，还高姿态地检查。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是中华民族忍辱负重传统美德的体现，也是共产党人个人服从组织、勇于承担责任优良作风的体现。不久，他被降职为副部长，但仍然毫无怨言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自那，邓老给我的印象更深了。

1934年10月，我们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我就同他失去了联系。直到1938年我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时，才知道他在新成立的新四军里任政治部副主任，也才知道此前他同陈毅同志一起，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南方3年游击战争。

我1938年9月到豫东敌后，直到1940年参加开辟淮北和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于1941年初奉命回师淮北路东，恢复失地。经过3个多月的战斗，恢复了淮北路东根据地后，我深感要巩固根据地，必须加强地方党和政府建设，以及做好地方群众的工作。而我自感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当时考虑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主要领导者有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三位老同志，他们都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于是，我就电请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刘少奇、陈毅同志，要求调一位同志来主持地区党委主要领导工作。同年5月初，邓子恢同志就调来了。

他到淮北后，很快就成立了淮北区党委，担任区党委书记。接着，又调回了原在这里工作的刘瑞龙同志，参加区党委领导。在以邓老为首的区党委集体领导下，淮北区所属各县、乡相继建立了各级党、政府和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新四军、支援新四军。这就为我们开展军事斗争，打击日伪顽匪，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1年夏，在淮京津浦路西坚持斗争的新四军四师，在反伪顽疯狂进攻的战斗中受挫，奉命撤到淮京津浦路东休整。根据中央指示，对这一阶段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深入检讨”。

在总结、检讨中，有的同志偏重追究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同志的个人责任，特别那些平时对雪枫同志有意见的人，借此机会大加鞭挞。一些人发言措辞激烈，无限上纲，显然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而作为华中局代表、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的总结发言就十分恳切、实事求是。他充分肯定了四师3年来及这次反顽斗争中的显著成绩，热情赞扬四师在路

西坚持斗争，“对整个华中的斗争起了很大的配合、推动作用”。他特别指出：“虽然在反顽斗争中确实遭到了损失，但还不能说是失败。因主力、干部大部保存，党在群众中留有深刻的影响，还有少数党员潜伏在群众中，并保存与部分两面分子的关系，在肖东、宿东还保存着部分地方武装，是将来恢复的基础。”同时，也指出了在反顽斗争中对敌估计不足，战术运用不灵活，未能集中兵力打敌一点等教训。他鼓励彭雪枫同志及四师指战员，要放下包袱，挺起腰杆，记取教训，尽快恢复元气，去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他还告诫，不要以个人的恩怨替代党的原则，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这一讲话，受到了广泛的称赞和拥护，对雪枫同志及四师指战员是很好的安慰和鼓舞，对少数抱有成见者是善意的规劝。会后，四师指战员一改刚撤到路东时那种低落、消沉的情绪，又精神振奋地掀起了热气腾腾的练兵、扩兵、备战热潮。

会后，邓老被任命为四师政委。

邓老的宽厚和民主作风，还表现在他善于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主张或已确定的事情。例如，在这次会后不久，我突然接到邓老电话，要我立即赶到师部驻地半城，商谈问题。邓老告诉我，在四师整顿过程中，有不少同志建议由我接替雪枫同志任四师师长，他也认为比较合适，就电报华中局和军部。少奇、陈毅同志同意并下达了电令。

这确实出我意料，同时也感到这个决定不妥。于是就直言不讳地谈了我的看法：四师正在整顿中，士气大振，指战员精神面貌很好，没有必要作这种改变。此时换人，不利于四师的整顿等等。随即建议邓老转报刘、陈首长，改变这一决定。几经磋商，邓老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上报领导。不久，邓老便电话告我：上级同意了我的意见。

1944年9月，彭雪枫同志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央军委命令由我接任四师师长。这样，我同邓老就“朝夕相处”、“风雨同舟”了。

在我们的共同工作期间，邓老更表现出诚挚、尊重和全力支持同级同志的友情和民主作风。他多次表明：作战、训练等所有军事工作，师长可全权负责。为让我大胆管理，放手工作，在军事工作上凡我找他商量或请他决定时，他都是表示同意，并说你决定了就行了。所以，有关军事、作战方面的

事,他不仅不干预,还从多方面给予保障和支持。有时我在外地作战,有些事情来不及征求他的意见,我就在一些决定或文电后边,署上他政委的名字,下发或上报。他都欣然同意,从无疑义。尽管这样,即使不在师部一起工作时,我也还是尽可能地以电话、电报或事后向他请示、汇报,同他商量,多听他的意见。也正因为我们军政领导的密切配合,全师上下形成了军政团结、上下一致、同战同乐、奋勇杀敌的局面。在日寇投降前后,我们连续取得了全部收复淮北路东、路西敌伪顽占领区的胜利。尽管这段时间的战斗异常频繁,条件也很艰苦,可我们的相处是愉快、和谐的。正如哲学家罗兰所讲“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和信任,才能真正合作,才能使我们感到人间的温暖和愉快。”领导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其结果更是如此。民主的作风,也是战斗力。

在人生的长河里,我与邓老的共事是短暂的,但他给我的记忆却是久远的。他尊重人、信任人、善于倾听别人意见的民主作风,是永远值得学习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尤为重要。

1994年4月于北京

## 代序三

### 怀念邓子恢同志

张震

子恢同志离开我们 20 多年了。但他那种长者的风度,对同志诲人不倦的精神,坚持原则、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品质,毕生革命、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至今仍深深刻印在我的脑子里,特别是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更是无以忘怀。

那是“文革”中的 1971 年,我刚刚“解放”出来,被分配参与葛洲坝工程施工任务。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已批准葛洲坝工程的设计任务书。但是,在扩大初步设计时,有两种不同意见,分歧较大。争论的中心是按原任务书,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还是挖掉葛洲坝,改为三江船闸工程。经过模拟试验,认为如果保留葛洲坝,三江出口窄,洪水时可能危及宜昌、沙市安全。周总理十分关心这一工程建设,指出长江是钢铁运输线,修坝后要保障畅通。如果影响大江通航,宁可不修。周总理还专门安排时间听取汇报,询问专家意见。这样,我得以再次来到北京。恰巧碰上“五一”节,通知我也去参观群众游行。

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子恢同志。他非常热情,问及一些他熟悉的同志的情况。第二天,又请我到他家吃中午饭,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谈论农村政策问题,坚持认为自己 50 年代向中央提出的有关农村工作的建议是对的。那时还是林彪、“四人帮”得势之时,我怕他由此又引起新的麻烦,劝他不要急,了解多一点情况再说。因为合作化运动时,子恢同志不同意一下子搞那么多农业合作社,当面与毛主席争论。后来,子恢同志又数次在部队和地方的干部大会上公开批评“左”的一套做法,宣传自己的主

张,结果惹了麻烦,被解除了农村工作部长职务。但子恢同志一直很坦然,从不灰心,他照样关心政治,关心他人。

在那一次谈话中,邓子恢同志同我讲,昨天毛主席曾问他,谭震林同志是不是“叛徒”,如不是应该解放。他问我知道情况否。我说,你们都是老一辈领导,比我更了解,我认为不是。因为1938年,谭震林同志到南昌领取新四军三支队关防印信时,曾被国民党一个县政府软禁了半天,说清楚身份,就放了。后来,子恢同志真的将调查了解的情况报告了主席,对震林同志的“解放”,想必会起到一些作用。当时,子恢同志自己处境并不太好,但还这样关心同志。这种精神,十分令人钦佩。

后来我又听说,毛主席曾经讲,邓子恢同志是单干户(没有组织活动),是阳谋(公开讲的,不是秘密活动),所以也被“解放”了。但是应有的待遇没有恢复。他生病住院,都是由夫人陈兰同志照顾。一天,陈兰同志外出,子恢同志起床不慎摔倒,脑部受伤。周总理得知后,亲自干预,派了一个同志照顾他,在病房增加了一块地毯,并批评说为什么要一个60余岁的老太太去照顾呢?然而子恢同志从此一直病重不起。作为子恢同志的老部下,我们都希望他早日康复。但我因在武汉工作,无法来京探望。一天,我突然从广播中听到举行子恢追悼会的消息,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我远在中南地区没能最后见上子恢同志一面,为尊敬的良师益友送行,这成了我终身的憾事。

子恢同志是老一辈革命家。我们相识是在“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当时,子恢同志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我在新四军第四师任参谋长。一次,子恢同志来四师检查工作,参加四师高级干部会议,旅以上干部都参加了。当时四师政委是师长彭雪枫同志兼任。雪枫同志向中央、军部建议,要求留下子恢同志当政委,得到了中央和军部的同意。这样,子恢同志就兼任四师政治委员和淮北区党委书记。我也得以在他领导下工作了好几年。在日常生活中,他有时也谈及过去一些经历。时间久了,我逐渐了解到,子恢与张鼎丞同志同是闽西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建立了闽西苏维埃政权与游击队。1929年,毛主席率部由井冈山到闽西,部队得到发展,有了立足之地,与邓、张二人坚强的工作基础是分不开的。子恢同志对财经工作十分内行,1931

年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2年任财政部长。当时有人要他多发票子,作财政开支,他不干,认为苏区货币只是市场媒介,不能多发,于是就批他“右倾”。后来,票子发多了,币值贬值,又将责任推卸于他,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打击。所以,1934年突围时,要他留在中央苏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与张鼎丞同志一起,在闽西依靠与群众的联系,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培养了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

子恢同志任四师政委兼淮北区党委书记时,工作任务甚重。他按照华中局决定,充实了淮北区党委,由刘子久同志任书记,建立各级党的领导核心。他主持召开边区代表会议,以皖东北行署为基础,组建了淮北边区行署,由刘瑞龙同志任主任,进一步加强了统一战线建设,团结了淮北与原豫皖苏区民主人士一起工作。他重视开展基层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实行了减租减息,为贫雇农谋利益。当时,有不少武装还掌握在非党人士手中,子恢同志提出了“枪换肩”的主张,把武器掌握在贫雇农手中,使这些武装真正成为打击日伪军、保卫民主政权的重要力量,并纠正了那种把统一战线视作“同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巩固和加强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当时,由于部队在豫皖苏伤亡损失大,不甚充实,而淮北边区又穿插着敌据点,政权也不甚巩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子恢同志与雪枫同志想了很多办法:一是决定除九旅机动外,十一、十二旅主力部队地方化。这样,既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打击了敌伪势力,又壮大了自己,为后来上升主力创造了条件。二是加强部队正规化训练。针对敌伪均设碉据守的特点,部队把攻坚战斗列为重要训练课题,轮流选调部队进行攻坚战斗演习,使部队战斗力提高了一步。三是加强部队政治教育。以毛主席强调的中国革命三大法宝来教育干部,按照延安整风文件来纠正党内不正之风。高级干部除自学外,还举办整风训练班,子恢同志亲自讲课。四是加强管理教育。因为部队新干部多,知识分子多,对我军优良传统不那么了解。当时有一个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是大学生,到部队后即派到一个连当文化教员。一次夜行军,有个战士因病掉队,文化教员就将其枪毙了。子恢同志抓住这个典型,进行我军优良传统教育。开设军事法庭审判了这个文化教员,同时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反对军阀主义》的文章,在《拂晓报》上发表。子恢同志还亲



自在干部大会上讲话,以此教育部队。这件事抓得及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纠正了错误,进一步改进了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密切了官兵关系,加强了部队团结。五是按照中央规定,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党政军群均利用时间开展农业生产,改善生活,减轻人民部分负担。六是在对敌斗争上,采取敌退我进办法,迫近敌人据点,开展反蚕食斗争,相机予以拔除,扩大了根据地,使各分区由敌伪隔断的点线逐渐连成一片。此外,子恢同志还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很有远见地提出要为胜利后的建设培训各类人才。除办了抗大四分校外,还办了淮北中学、联合中学与江淮大学。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有不少在建国后已成为各方面建设的领导者。在四师工作期间,子恢同志与雪枫同志互相尊重,配合非常默契,堪称军政主官密切合作的楷模。

后来,子恢同志离开四师到豫皖苏边区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又到中原地区担任领导,建国后则调到中央主管农村工作。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也常从他的来信中得到教诲或面谕。他是我的老领导,也是一位良师益友。今天,我们要学习子恢同志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把党的基本路线贯彻到底,完成子恢同志的未竟事业。

1993年11月



## 前 言

邓子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是原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淮北区党委书记。

邓子恢，1896年8月17日出生，福建龙岩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闽西工农红军第7军19师57团党代表，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二军、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财政人民委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部长。1939年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开展皖东敌后游击战争。

1940年下半年至1941年初，国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日军为开辟太平洋战场，对蒋介石加紧诱降，对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频频发动“扫荡”和“蚕食”。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以华中为重点，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6月，蒋介石企图逼我新四军撤出华中，退至黄河以北，尔后凭借黄河天险，堵塞归路，置我军于死地。自此，皖北、淮北、苏北磨擦事件接连发生。党中央、毛泽东根据上述情况，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除从舆论上在全国范围内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外，命八路军一部迅速南下华中，协助新四军巩固和扩大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黄克诚率八路军三四四旅及新二旅共5个团，12000余人，及500余名干部，到达豫皖苏边根据地之新兴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活动于津浦路